加快综合交通现代化步伐

中央党校厅局班学员　浙江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厅长　郭剑彪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由“交通大国”向“交通强国”迈进的重要时期。浙江省作为东部沿海最发达地区之一，必须加快综合交通现代化步伐，在“交通强国”建设进程中进一步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

准确把握综合交通现代化的基本思路。五大建设理念引领。“大港口、大路网、大水运、大航空、大物流”等浙江现代综合交通五大建设，是有机融合的“一个五”，而不是相互分离的“五个一”，要在“一个五”的整体指导下，抓好具体的“五个一”。重视多式联运，铁、公、机、水、管等综合交通各种方式相互连接、相互强化、相互替代，有机统一、紧密衔接、互联成网。研究多元互补，各种交通方式既有机结合，又形成互补。体现多维衔接，特别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更要注重依靠发展立体交通。

四大走廊服务全局。打造“都市经济交通走廊、海洋经济交通走廊、开放经济交通走廊、美丽经济交通走廊”四大交通走廊，就是要围绕更好地服务四大经济，来支撑浙江经济的发展，引领浙江经济的转型。打造都市经济交通走廊要突出三个构建，即突出网络构建、突出枢纽构建、突出公交构建。打造海洋经济交通走廊要坚持三个强化，即强化港口枢纽，强化联运通道，强化延伸拓展。打造开放经济交通走廊要注重三个拓展，即拓展陆港对外交通，拓展海港的对外合作，拓展空港对外连接。打造美丽经济交通走廊要围绕三条线，即风情旅游线，科创产业线，富民经济线。

骨干网络支撑全省。构建“三纵四横两对角”的核心骨干网络。“三纵”即东线沿海通道、中线沪浙赣通道、西线浙西（皖杭衢）通道。“四横”即浙北（湖嘉沪）通道、杭绍甬（舟）通道、已建成的台金高速公路和新建台金铁路、从温州到丽水、金华、衢州的公铁通道。“两对角”即宁波到金华，重点新建义甬舟铁路；杭州到温州、台州，杭绍台高速公路已开工，关键是要进一步谋划铁路。“三纵四横两对角”是“十三五”浙江地面交通的网络大格局。在加快推进骨干网络建设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密公路网、铁路网、水路网、航空网。

万亿投入强化保障。打造四大交通走廊、构建综合交通网络，需要项目作支撑、投入作保障。加大综合交通投入，必须解决好投向、投速、投效等问题。选准投向。投向重大网络，包括高速铁路网、轨道交通网、国家高速公路网和陆海联运、公铁联运大通道等。投向重点区域，包括四大都市区、7个区域中心城市与县城的联通等，加快都市区之间、都市区与省域中心城市及都市区内部互联互通。投向重要节点，包括跨省通道、城市枢纽、重要连接线和一批服务于国家战略的特别重大骨干通道。加大投入。初步梳理“十三五”综合交通项目计划投资超过1万亿，其中轨道交通5000亿，公路、航空、水运等其他交通投资5000亿。要大力抓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千方百计解决交通项目推进中的难题，加快构建水陆空多元立体综合交通体系。提升投效。注重综合效益，做到有效投入、精准投入，花好钱办大事，发挥综合交通服务和引领经济、民生的综合效益。注重存量盘活，不仅要重视划新线、建新路，更要研究老路的改造提升。注重标本兼治，在加大建设的同时，创新形成更加完善的管养体制机制。

切实强化综合交通现代化建设的保障措施。坚持规划引领。建立由交通运输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综合交通发展规划编制机制。规划编制要突出三个原则：突出引领性。充分体现综合交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保障作用。突出综合性。要充分考虑各类交通方式的相互关系，统一规划、有机衔接。突出操作性。要根据轻重缓急排出具体项目，对于既定项目要刚性执行。

强化要素供给。强化用地保障。积极争取有利于交通项目推进的用地政策，加强省级对重大工程的统筹安排。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积极争取国家专项建设基金和政策支持，加大各级政府性专项建设资金、债券的支持。鼓励社会资本投入。“以交通挖掘资源、以资源换取交通”，增强交通投融资能力，积极推进PPP合作模式。

创新体制机制。强化综合统筹。充分发挥省综合交通改革与发展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作用，研究协调解决全省交通改革发展重大事项。推进综合改革。对接交通运输部的“大交通”管理体制，支持地方开展管理体制改革。深化专项试点。加强部省合作，充分发挥“绿色交通示范省”等5项国家级试点的优势，率先探索突破。

严格落实责任。目标同向。交通重大项目一律要落实投资主体、责任主体，明确目标、进度、责任、措施、时间节点，做到省市县三级联动。形成合力。发挥省级行业管理部门的组织协调支持作用，相关国企平台投资建设主力军作用，各地、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督查考核。强化综合交通重大项目的督查考核，推进项目尽快启动。

加强队伍建设。提升队伍素质，提高全行业从业人员队伍素质。营造干事环境，着力打造一支敢于担当、崇尚实干、素质过硬、富有激情的交通队伍。严肃廉政纪律，进一步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想腐的保障机制。加强作风建设，营造干事环境。

国有企业薪酬管理改革的问题及对策

中央党校中青一班学员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王海怀

国有企业薪酬管理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要回应社会公众关切，促进公平正义，又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引领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的作用。

国有企业薪酬管理改革存在的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有待完善。特别是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对经营层的“任免权”“考核权”仍然没有落实，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难以真正发挥科学决策的作用。二是绩效考核注重年度和短期绩效，在引导国有企业如何服务国家战略，加强国际化经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上发挥作用还不充分。三是“三项制度”执行不到位，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特别是严格执行“三项制度”还缺乏体制机制的保障。四是客观存在部分群体间薪酬差距较大的问题，引发社会广泛质疑。五是班子副职考核是难点，“大锅饭”还比较严重。

在薪酬改革方案出台后，2015年中央企业负责人实行了薪酬普遍按60万封顶的“一刀切”办法。“一刀切”的办法执行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需要引起关注：一是薪酬上下倒挂；二是不同行业负责人之间的薪酬“平均化”；三是效益好、效益差的企业负责人间薪酬出现“平均化”的趋势。

国有企业薪酬管理改革对策及建议。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主要是要破解“效益优先，更加把兼顾公平摆在突出的位置”的难题，构建定位准确、分类明确、分级精确、绩效优先、兼顾公平、年度和任期考核相结合，短期和长远相衔接的业绩考核体系，切实发挥业绩考核的战略引领作用、改革推动作用和管理导向作用，既保持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又充分回应公平正义的社会诉求。把握好平衡点，是这轮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把薪酬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方案结合起来，注重有机衔接，整体推进。薪酬改革不能单兵突进，需要和国有企业监管体制改革，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整体配套。包括监管分离，由管人、管事、管资产为主，到以管资产为主；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国有现代企业法人治理；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前提下，推进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推进国有企业分类监管，分类考核等。

注重薪酬制度、履职待遇改革同步推进；加强党的建设和国有企业巡视，落实“两个责任”同步推进。个别国有企业所谓“天价薪酬”，履职公私不分，公款消费，相当程度上是执行制度不力的问题，的确需要加强监管，但不能因此推定整个薪酬制度需要“推倒重来”。

缩小“三个差距”、更加注重公平方面，要防止行政调节过度，走向新一轮的平均主义，从而削弱国有企业的发展动力。中央企业分为公共服务类和一般商业类两大类企业，功能各有侧重，前者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后者更加强调市场竞争和经济效益。在分类监管的原则下，高管薪酬应采用差异化薪酬管控的办法，综合考虑国企高管当期业绩和中长期持续发展，对部分行政任命的央企高管人员以及部分垄断性的高收入行业的央企负责人薪酬水平实行限高是必要的，但不宜搞“一刀切”。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仍然应该遵循市场化原则，以业绩好坏定薪酬，充分调动企业经营者和核心技术、管理骨干的积极性。缩小央企内部分配差距，宜采用“增量调整”的办法，用央企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少涨或不涨，其增幅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的办法来解决，不宜采用大幅降薪的办法来缩小差距。

深化经济增加值考核，把短期激励与中长期激励相结合，引导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做久。2008年第三任期开始，中央企业引入经济增加值考核，作为全面衡量企业价值创造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指标。经济增加值考核不仅考虑利润创造，还考虑资本占用成本；不仅考核投入的净资产以及必要报酬率，还考虑财务风险；既能有效推动企业提升价值创造能力，又能促使企业关注财务风险，保持稳健、持续经营。

探索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业绩体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管理也是生产力，对企业的价值创造具有积极意义。目前的EVA考核已将科技研发费用支出作为计算税后净营业利润的加回项进行调整，直接参与企业价值创造指标的计算，并且参与业绩分配体系。在业绩考核体系中，可设置管理控制类指标，将有关考核得分计入年度负责人业绩考核得分中去，直接参与分配。这样能够鼓励和促进企业不断提升科技研发水平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价值创造的发展潜力，为企业更好地发展奠定基础。

在股权激励上，财政部、科技部、国资委联合制定下发了《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暂行办法》，在政策制度层面有了实质性突破。其核心内容有三条：骨干持股，不能人人持股；个人持股比例不超过1%，总比例不超过30%；人走股退，不固定持股。

将绩效考核、财务预算，工资预算制度紧密衔接起来，加强监管，形成体系，从制度体系设计上确保薪酬“总量控制，效益升、薪酬升，效益降、薪酬降”，并加强巡视、审计监督。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发展新突破

中央党校中青二班学员 中国建设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兼市场风险部总经理　杨　军

5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对权威人士的专访《开局首季问大势》，以朴实、直白的语言辨方向、抓关键、谋全局，对经济问题进行了全面透彻剖析。笔者理解，根本要求就是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实现发展新突破。

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是L型，这是统筹各项工作的基本出发点。2013年中央提出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2014年提出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经济L型增长判断，是一个不断探索客观发展规律的过程，也是从方向思考到清晰判断的过程，是一个凝聚共识的科学判断。

笔者曾经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增长的统计特征，对我国未来5年的GDP变化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于“十三五”期间明显降低，均值约在6.5%左右，同时我国经济将在2018年左右开始企稳。这个研究结果从一个侧面也佐证了L型走势判断的科学性、合理性。

正因为这一判断实事求是，符合实际，所以很快形成共识。只有正确、客观、冷静的认识到经济发展形势后，才能对症开出有效的治理措施。

从五大要素入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理解经济发展的本源。从中长期经济发展来看，总供给取决于制度资源、劳动力、自然和环境资源、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等五个方面的要素供给。下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样需要从提高五大要素禀赋能力入手。

制度层面。进一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更大程度和更广范围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逐步完善法治体系。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各项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民主化。

劳动力方面。通过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激发劳动资源的贡献。重点培养各类企业家、科学工作者、各级干部等三类关键人才，使人口红利逐步升级成人才红利。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发挥人才在解决科技创新、环境治理、要素使用效率等问题方面的作用，以人才红利带动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资源方面。加大资源利用的效率和质量，全面节约高效利用资源，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层次升级迈进。进一步明确环保标准，严格标准实施，通过市场手段去产能。

技术创新方面。落实科技三会的决策部署，按照三个面向，完善技术创新机制，培育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加大双向开放力度，在区域发展战略、自贸区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拓展新市场。培育国内企业跨国经营的能力，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更大程度地尊重、认可知识资本的作用，为新的技术突破创造机制条件。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提升品牌影响力，提高服务和产品质量，更好、更快地满足社会需求。

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创新的根本方向是依靠市场的力量，打破阻碍竞争和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培育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以价格作为主要调节因素，由市场力量决定产业发展的方向，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科学管理水平，探索互联网时代的管理模式，夯实制造业优势基础。深度借助大数据、机器人等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精准性。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还要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树不能长到天上，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负增长，甚至让老百姓储蓄泡汤”。如何把握好去杠杆的“度”、防范系统性风险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个关键点。

截至2015年，我国实体经济的全社会负债规模大体上为145.94万亿元，债务规模相当于当年GDP规模的2.16倍。其中，中央政府负债为10.66万亿元（主要是国债），地方政府负债17.18万亿元，国有企业负债为79.07万亿元，居民负债为27.03万亿元。

从各主体的偿还能力来看，债务规模总体安全，但不同债务主体、不同行业、不同区域差异较大。笔者的研究发现，负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已经超过“由正转负”的拐点，靠信贷或债务规模推动的GDP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如果进一步加大债务规模，甚至可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适度控制债务规模，有针对性去杠杆非常重要。要针对煤炭、钢铁、房地产、建筑等不同行业特点，积极稳妥去杠杆，同步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实现三大产业均衡发展。

去杠杆过程中，金融要回归本原。股市要立足于恢复市场融资功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汇市要立足于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发挥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房子是给人住的，这个定位不能偏离，通过人的城镇化“去库存”，通过完善房产税、遗产税、增值税等税收制度，建立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机制。

创新国企党建 服务国家战略

中央党校中青一班学员 云南农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陈祖军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国际产能和制造合作，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全球经济深刻调整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创新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对于深入贯彻落实“一带一路”重要倡导、实施国有企业“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关系到在境外国有企业党的核心作用的发挥，关系到“走出去”战略的稳步推进实施，而且关系到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对外开放和国际形象。

国有企业党建融入国家战略的意义。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云南考察调研时指出，云南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着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着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着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着力发挥党组织作用，从组织上落实从严治党，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云南农垦集团近年来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主动融入全球经济，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只有毫不动摇地在境外开展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把党的领导体现在引领企业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上，才能确保境外企业既能“走出去”，更能“站得住、立得稳、做得强”。

国有企业党建服务国家战略的作用。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也是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加快“走出去”进程中，必须坚守的政治方向、政治原则。云南农垦集团境外党建工作主要围绕三项重点任务。一是发挥引领作用，使党组织成为企业发展的“定向仪”。二是发挥凝聚作用，使党组织成为做好群众工作、培育员工主人翁意识的“大熔炉”。三是发挥桥梁作用，使党组织成为推动企业践行公共外交、打造良好国际形象的“民间大使”。“一带一路”战略的目标是“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要实现这一目标，让“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得到广大外国普通民众的认可，需要每一个在国外的个人、企业和组织作出努力。云南农垦集团在老挝投资橡胶已十余年，集团党委着眼大局，扎实推进企业境外党建工作，在老挝赢得了人心，集团实现不断盈利且越做越大。

实现国有企业党建创新的途径。国有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境外产业和项目条件艰苦，任务重、要求高，为确保生产任务的顺利推进和完成，境外党组织的凝聚作用和党员的带头作用至关重要，只有不断加强党对境外企业的领导，推进境外党组织政治核心、思想引领、组织建设，才能为境外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才能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推动境外业务快速发展的竞争优势。一是需要不断探索境外党组织的组织管理方式，提升境外党建的针对性。境外党组织的科学化建设，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围绕境外国企的工作规律，找准切入点，突出党建在境外国有企业整体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制定不同类型境外党员群体党员教育管理的实施方案，强化党员发展、党性教育、组织生活、组织管理、考核等环节的流程管理，统筹各种不同形式党建工作载体，提高工作针对性。二是需要不断探索党组织设置架构的适应性变换，提升境外党组织设置灵活性。探索升格调整境外的国有企业党组织组织架构，不断调适自身的组织设置，以便于较好地适应境外环境和人员流动的深刻变化，不断提高党组织建设的适应性和制度化程度。发挥境外使领馆的党组织牵引作用，探索使领馆党组织共建，实现与国内党建工作同步推进。三是需要不断探索境外党组织的组织聚合形态，提升境外党组织活动的实效性。点状化、分散化进行党的组织活动。进一步突破条条、块块限制，突破传统在国内的大规模党的活动形态，分散化点状化单位、区域内党建资源，按照“便于人员参与、便于活动开展、便于管理服务”和“岗位相近、地域相邻”原则，以化整为零的视角对基层党建工作进行谋划，变块状规划、成片推进为党小组、党支部的活动开展。同时积极探索境外党组织的网络新媒体党建，探索境外党建的网络化、线上化，将微信、QQ群等平台作为党建载体。四是需要不断探索境外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提升境外党组织发挥作用的群众性。由于境外党员群体分布呈现多样性，需要我们强化境外国企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积极转变领导方式，从强制与服从、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走向沟通与协商，积极构建“服务发展、服务企业、服务民生、服务员工、服务党员”的服务型党组织，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提升境外党组织的群众性。五是需要不断探索境外党组织发挥政治把关功能，提升境外党建的安全性。在政治上发挥核心作用，对境外党建的周边政治、外交、政策环境进行把关，确保党的活动的安全性；在企业运营及技术运用的把关，确保境外党组织和企业不受到境外势力的渗透和产生商业损失；发挥经济上的廉政把关作用，确保境外企业在监管不便的现实条件下，不发生廉政风险。